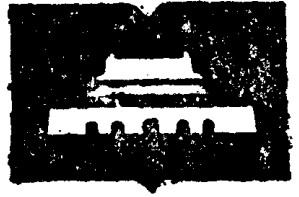




祖国丛书

青年英烈

QING NIAN
YING LIE
QING NIAN
YING LIE
QING NIAN
YING LIE
QING NIAN
YING LIE



祖国丛书

青年英烈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青年烈士传)

本社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吴方泽

封面设计：葛英

青年英烈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青年烈士传

本社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7.5印张 2插页 191千字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3.45元

ISBN 7-5006-0943-4/K·150

目 录

播火种的人

——张太雷烈士传略……………林子 2

“岂能坐以待毙！”

——张秋人烈士传略……………叶炳南 2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夏明翰烈士传略……………夏远生 38

彪炳勋业 千秋永存

——魏野畴烈士传略……………王友恭 58

“啼声响处人已遥”

——徐玮烈士传略……………周颂辉、徐毓瑜、徐立人 76

剑魂

——毛泽建烈士传略……………陈宝书 94

少年斗士

——欧阳立安烈士传略……………毛和利、庄永淑 110

刚毅的女性

——徐全直烈士传略……………刘茂舒 130

中国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

——顾作霖烈士传略

.....朱敬禹、卢鸣、陶尧明、任武雄 150

大别山的儿子

——吴焕先烈士传略.....李 湘 170

“甘向艰辛阅岁华”

——邓雅声烈士传略.....湛有恒 191

中国工农红军卓越的青年将领

——朱云卿烈士传略.....程志远、何国彬、廖远标 208

走向生命的光辉顶点

——李耘生烈士传略.....李福全 221



张太雷烈士

我生为真理生，
死为真理死，
除了真理，
没有我自己的东西。



播火种的人

——张太雷烈士传略

林 子 * * * * *

张太雷(1898—1927):原名泰来,学名张复,江苏常州人。1911年夏,考入常州中学堂预科,第二年转入本科。1916年春,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1920年参与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俄国伊尔库茨克任远东共产国际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同年当选为少共国际执行委员。1922年当选为青年团中央委员,次年当选为团中央常委。1924年任上海《民国日报》主笔。1925年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同时兼任广州《人民周刊》主编。1927年4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同年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2月广州起义后,任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代理主席。12月12日,牺牲于敌人的乱枪之下。时年29岁。

幼年：在家庭和学校里

1898年6月17日，张太雷诞生在常州西门外的外祖父家。父亲张亮采是个穷秀才，家里没有一分田地，因贫困娶不起亲，只好入赘于薛家。外祖父薛锦之是个小手工业者，以制作皮革为生，工作艰苦，收入微薄，全家生活很清苦。张亮采为儿子取名泰来，就是希望他否极泰来，能转变家庭的处境。

1901年，张亮采托人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找到一个小职员的工作，全家迁往江西。他在工作之余，便教女儿泰临、儿子泰来识字、背诗。泰来从小聪慧过人，甚得父亲喜爱。

1906年，泰来8岁那年，父亲突然患病去世，母亲薛氏，只得带领幼小儿女，扶柩回到常州，靠给别人做针线度日，生活更加拮据。

泰来该上学读书了，但学费从哪儿来呢？薛氏一趟又一趟地跑到西郊小学去，申请免费，终于得到校长的同意，泰来入学了。

在学校里，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平日爱打抱不平，看到有同学受人欺侮，便挺身而出。1911年夏，他小学毕业时，校长见他少年有为，为他取名张复，勉励他要复兴中华，并且资助他考进了常州中学堂（今江苏省立常州中学）预科，第二年转入本科。

当时瞿秋白是张复在常州中学堂的同学，他俩受民主思潮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成为好朋友。当武昌辛亥革命的消

息传来时，他们和进步同学一起，带头剪掉象征封建主义的发辫，走上街头，进行宣传。他们还一起阅读《民呼报》、《申报》、《新民丛报》和《仁学》等等进步书刊。

有一天，张复来到瞿秋白家里聊天。谈到辛亥革命后，人民生活还没有得到改善时，秋白拖长了语调，念出了老子的一句话：“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张复接着说：“还有庄子的话呢：‘今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其可得耶’。”这直接道出了对军阀统治的不满。

秋白接着又说：“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他用曹操的诗句来表示自己当时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苦闷……

假日，这对好朋友还经常一道出去游玩。一天，他们到舣舟亭去玩。舣舟亭建在出东门的文成坝上，传说是宋代苏东坡从岭南归来，到常州时停船靠岸的地方，后人就建这亭子来纪念他。亭子建在朝东河边，亭南土山高耸。他们拾级而上，看到有万寿亭（皇亭）遗址，是当年在常州任上的清朝官吏为乾隆下江南而建立的。

秋白感慨地说：“这儿几经兵变，只剩些断碑残碣了！”

张复说：“苏东坡的舣舟亭修在山下河边，而乾隆的万寿亭却修在山上，难道苏东坡不如乾隆吗？”他的脸上充满愤懑之色。

他们俩又议论了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和他的诗，称赞苏东坡的才华是千秋金石。

从这里可见他们少年时的思想之一斑。

1915年临近暑假时，张复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有人介绍他去钱庄做事，这是个赚钱的美差。张复拒绝说：“我最痛恨的是铜臭十足的人，最不愿做有铜臭气的事。”后来，他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但因北大学制长，经济负担太重，冬天他又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这里收费少，还可以半工半读，同时也切合他要用法律来拯救中国社会的志向。

1916年春到1920年夏，张太雷在北洋大学学习，课余在英文《华北明星报》担任编辑和翻译工作，得以解决学费和生活费用，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1919年2月，张太雷在天津组织了一个进步团体：“社会改造社”，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大学生组织，宗旨是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有科学文化的新社会。

同年，张太雷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他是北洋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参加了天津市学联组织的讲演队，活动在市区和附近数十里的城镇乡村，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他还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天津各界抵制日货委员会，进行检查日货活动。

第二年，他因反对北洋大学校长禁止学生参加运动，又被学校开除了。

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创建者之一

张太雷参加五四运动后，就改变了从事法律工作以拯救社会的志向，决心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魏金斯基等人来中国，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张太雷离开北洋大学，便以《华北明星报》为掩护，给魏金斯基当翻译。他陪魏金斯基先到北京找李大钊商谈。5月，又一起到上海帮助陈独秀等进行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8月，他还同俞秀松一道，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9月，张太雷来到北京，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共产党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他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不久，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回到天津，以“社会改造社”为基础，成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青年团的书记。张太雷和团员们一起，经常到天津、唐山等地的工厂去，开展工人运动，还主持办了一张报纸——《劳报》，研究、报道工人的活动情况。《劳报》出了不到一个月，被当局查禁。张太雷又创办《来报》，继续出版。后来，他又加上一层解释，说这份报纸的宗旨是：“意味着抛弃陈旧的过去，争取崭新的未来。”《来报》直到报纸的发行人被捕才停刊。

1921年1月，张太雷受党的派遣，到俄国伊尔库茨克远东共产国际书记处工作。6月，他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回到中国，帮助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创立阶段的活动情况，张太雷在1921年春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里写道：

“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于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组织起来的。其后在中国其他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一些

小组。但是，直到1921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

“我们截止到目前(1921年)的工作，还只是准备性的……我们在罢工运动方面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几乎所有近期(1920—1921年)的罢工斗争都是由我们共产党员同志们组织和领导的。我们为工人出了一系列的周刊和报纸，以及多种小册子和传单……正在为水平较高的同志发行一套独特的宣传书籍《袖珍的社会主义者丛书》，到目前为止，这套丛书已经出版的第一批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们还出版了中文杂志《共产党》。

“截止1921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7个省级党组织(均有选设的委员会)，即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武汉和香港等。”

这些情况的掌握，说明了张太雷在建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1921年冬天，张太雷陪马林到广州和孙中山会谈，他考察了广州青年运动的情况。回到上海后，张太雷向中央局建议，把各地青年团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中央局接受了他的建议，成立组织处，以上海团组织为基础，进行筹备，并委托张太雷负责筹备工作。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时已有团员约4000人。张太雷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作了团纲、团章草案报告，他是中国第一个团章的起草人。

会上，张太雷当选为团的中央委员，1923年，当选为团中

央常委，主持团的日常工作。

张太雷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建，贡献了自己的身心与力量。

为国际共运奔波

1921年1月，张太雷来到伊尔库茨克，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书记，负责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之间的联系工作。他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使者。

张太雷到任后，曾多次编写有关中国情况的通报，并将通报寄到苏俄各家报纸的编辑部。他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报告（见前章）。他不仅谈中国问题，也很关心国际性的工作。他力求要从中汲取更多的组织经验，因而常主动扩大自己的工作范围。

5月，张太雷参加筹备朝鲜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局。成立大会召开时，他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还代表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向大会致词。他还积极参与起草了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用日文发表的对日本工人的宣言，并帮助付印。

6月22日，张太雷和杨厚德一起，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介绍中国革命情况的发言，呼吁共产国际重视和支持中国革命。在莫斯科期间，他还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少共国际的执行委员。

共产国际为了对抗美帝国主义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决定

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同一天),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以显示远东民族革命的强大力量。

张太雷参加拟定了召开大会的方案。他主张扩大参加会议的代表范围,尽可能地从中国、朝鲜、日本和太平洋岛屿所有革命组织以及民族主义的组织中选派代表,不应该将代表范围局限在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内。他的主张得到共产国际执行部的采纳。大会共计125人,中国派去了有54名代表的庞大代表团,其中工人、农民代表各9名,知识分子和学生代表共24名,其他9名。这个代表团的组成和到达,与张太雷的卓越才干和组织能力是分不开的。会前,他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回到中国,联系中国选派代表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他还秘密到日本,商量如何派代表的问题。他亲自考虑代表团来苏联的路线,确定接头地点,还留心中国的报刊,注意中国军阀混战的某些路线,以避免代表遇到意外。当时苏俄正受包围和封锁,他象一位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样,指挥代表团越过封锁线。

会上,张太雷作了主要报告。他起草的大会致远东各国劳动人民宣言书,鲜明地提出大会目的是“把东方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口号是“争取国家的和平和独立”,“耕者有其田,工厂属于工人”。

1924年1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当时担任中国驻少共国际代表的张太雷(同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各国代表一起,在车站哀痛地迎接列宁灵柩,在工会大厦瞻仰列宁遗容,并参加

了列宁的葬礼。他曾写了一篇《列宁底死》的文章，刊登在2月19日出版的上海《民国日报》上，记述了他亲身参加悼念列宁的活动，表达了他对革命导师列宁的深切哀悼。

同年，李大钊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张太雷担任秘书和翻译。他详尽地向代表团介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情况。他精力充沛，毅力惊人，工作做得有条不紊。李大钊称赞他“学贯中西，才华出众”。

在苏联工作期间，张太雷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片山潜，越南革命家胡志明等，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有人称誉张太雷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国际共运的先行者。

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出力

大革命时期，我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这是国共两党极重大的决策，张太雷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就的，干得非常出色。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旧民主主义的、复杂的、松懈的政治联盟。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的许多人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孙中山为首的左派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斗争，但屡遭失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运动的兴起，使孙中山重新振作起来，倾向于联俄联共。

1921年8月，共产国际特派马林到中国来，从事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统一战线）的活动。张太雷从莫斯科回来，担任马

林的翻译和助手，两人一起到桂林，和孙中山会谈，做争取联合的工作。开始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决心还不大，同时国民党内部和孙中山左右的人意见也有分歧，阻力是不小的。张太雷便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的机会，做了不少解释工作；与孙中山会谈时，有时马林不便直言，张太雷便从中协助，宣传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国情，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最后使会谈获得圆满成功。

1922年8月，中共中央由陈独秀主持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张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经过争论，会议决定党内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推动统一战线的建立。会后，李大钊等会见了孙中山，商谈后，由孙中山主持，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参加了国民党。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代表30多人，张太雷是其中之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仍是国共合作问题。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同年8月16日，张太雷参加了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去苏联参观访问。这是孙中山派去考察苏联的军事、政治和党务的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共4人，于9月2日到达莫斯科。蒋介石后来曾说：“访问代表团四人中，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党员……代表团各种计划、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可见，张太雷在代表团内，是敢于坚持原则的，同蒋介石是有斗争的。

1923年11月29日，代表团访问结束。蒋介石回来向孙中山汇报时，表示了对苏联共产党的疑虑和他的不安心理。孙中山的回答是：“未免顾虑过甚。”

这次参观访问，是国共合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政策，是有促进作用的。

张太雷没有随代表团一起回国，留在苏联工作了一段时间。

1924年8月，张太雷回国，在共青团担负领导工作，还在上海大学讲课，并担任上海《民国日报》主笔。这时期，他为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工作。

张太雷在上海大学讲课时，反复强调：“为了反帝反军阀，联合战线是非建立不可。”“和国民党必须联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必须建立。”他要求同学们积极支持国民党的工作，如为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写稿、当记者。他说：“我们不去干，就给右派占领了。”他还说：“当然，我们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一定要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要给一些官僚政客腐蚀了、同化了，一定要保持无产阶级党性。”他对孙中山很崇敬，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我们应当与他合作，帮助他做国民党的工作。

1925年春，党派张太雷去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

鲍罗廷是孙中山聘请的高级顾问，他是共产国际委托前来指导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等事宜的。张太雷参与了这一系列的工作，还担任鲍的安全保卫任务，表现得十分机智、细